

辛亥革命与华侨

洪丝丝等著

民 众 版

辛亥革命与华侨

洪丝丝等著

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华侨

洪丝丝等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75印张 82,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500

书号 11001·493 定价 0.43元

目 录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洪丝丝 (1)
辛亥“三·二九”起义中牺牲的华侨烈士	孙 健 (20)
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贡献	郭景荣 (27)
美洲致公堂与辛亥革命	俞云波 (57)
缅甸华侨与辛亥革命	肖 泉 (70)
附录 缅华参加辛亥革命大事记要	(88)
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台山县与华侨	刘玉遵 成露西 (92)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洪 丝 丝

华侨对辛亥革命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这一次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所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书）孙中山还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是：“华侨是革命之母”。（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固然是中国社会的产物，它的主要条件是在中国社会里面孕育成熟的，但是孙中山这句名言正如“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格言一样，都是比喻的话，不能机械地衡量它的准确性。他用这句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他的革命活动是从华侨里面开始，革命团体的第一批成员和最早的赞助人就是华侨，华侨在革命活动中建立了辉煌的功绩，对于促成辛亥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也说：“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现在缅怀华侨这一段光辉历史，当还有现实的意义。

（一）

华侨为什么那么热心参加辛亥革命呢？这同他们辛酸的遭遇

和爱国热情很有关系。

在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早已经遍布于世界五大洲。据中外一些学者估计，1902至1908年的华侨人数就达到七百万至九百万。他们的出国有这几个主要原因：一、由于列强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国社会经济濒于破产，人民谋生非常困难，同时封建剥削又非常残酷，所以闽粤等省很多穷苦的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找生路。二、当时东南亚和美洲、澳洲、非洲大部分地区正待开发，都很缺乏劳动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拐骗和强迫中国大量劳动人民到国外去充当契约劳工（“猪仔”）。三、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国内政治灾祸，不得不到海外去。明朝灭亡以后就有许多反清分子逃亡到海外，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也有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迫到海外避难。总之，他们的出国很多是含着辛酸眼泪而去的。

清朝长期把华侨看作背弃祖宗庐墓的“天朝莠民”，曾经严禁人民出国。例如大清律例曾规定：“凡官员民兵私自出海贸易，又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斩。”《皇朝通典》还载有雍正五年的“上谕”，说什么“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分之人”，要限期勒令他们归回，逾期不回的就永远不准许他们回来。后来这种禁令虽然逐渐松弛，但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有点积蓄的华侨回到国内，常常免不了遭受敲诈勒索，这使他们不免感到悲愤。

华侨对侨居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有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许多国家和殖民地遭受种种歧视和虐待。例如在美国曾被列为与印地安人同一等级的民族，不能同白种人平等；在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也被荷兰殖民政府当作“低等”居民，不能同欧美各国和日本侨民享受同等待遇。他们甚至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残酷的迫害、屠杀，许多地区排华暴行层出不穷。可是清

朝统治者长期认为华侨“自弃王化”，“咎由自取”，听任他们由人凌虐宰割。到了清朝晚期，虽然有一些比较开明的外交官如薛福成、黄遵宪、陈兰彬等，曾为华侨悲惨的遭遇呼吁，可是清朝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在列强侵略之下，已经岌岌不能自保，根本没有保护华侨的力量。

由于这些原因，华侨迫切希望祖国强盛，并且有个良好的政府关心他们的疾苦，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同时，他们在国外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华侨里面出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孙中山的老家虽然是农民家庭，但是他的哥哥孙眉（孙德彰）是檀香山畜牧家，属于华侨资产阶级。孙中山十三岁就到檀香山，在那里受过教会的教育，又曾在哥哥的店里工作，可以说也是华侨。后来他在香港受高等教育，又曾在伦敦等地勤奋地阅读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和文学等类书籍，考察英美等国的社会，接触当时世界各种思潮。他长期住在海外，同华侨有广泛的接触，亲眼看到华侨悲惨的遭遇，痛感国家民族危机的严重，因此激发了爱国思想，并且认为中国必须改革政治才能够富强。这个主张，适应时代的潮流，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也符合广大华侨的根本利益。关于这个问题，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这本书里有一段扼要的论述。他说：“由于华侨资产阶级在海外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封建主义又较少联系，因此它是中国资产阶级中革命性较强的一个阶层，孙中山主要地正是代表着它的政治倾向。”吴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且在国外留学和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同华侨也有接触，他这一段话是很有见地的。

据福建省1955年的调查统计材料，该省的华侨，工人占65%，独立劳动者占20%，小商贩占10%，自由职业者占2%，工商业家

占 2.23%。虽然华侨的职业和成分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七十年代以来，高级知识分子大量增加，自由职业者的比重有所上升，同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家也有增加，但是劳动人民始终占着大多数，这在辛亥革命时期更是如此。这些苦难最深的华侨劳动者热心支持祖国革命是不难理解的。

华侨工商业家很多是从工人和小商贩出身的，他们与国内封建势力的联系又的确比较少，所以比国内的资产阶级容易同情革命。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的舅父是檀香山的华侨，因此他也到檀香山去谋生。最初他在菜园当工人，后来转入农牧场当劳工。当时檀香山还未被美国吞并，由土著的女王统治。他得到舅父的帮助，向当地政府领到一块土地，进行垦植畜牧，经过惨淡经营，终于成为一个拥有几百亩牧场的资本家。华侨很多工商业家的出身，同孙眉是大同小异的。孙眉对孙中山革命事业抱着满腔同情，尽力给予赞助，当不是单纯由于兄弟的情谊，而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华侨工商业家的革命性在中国资产阶级中确实是比较强的。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华侨工商业家还有很多，就是一个明证。

华侨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孙中山本人和他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就是华侨知识分子中杰出的革命家。廖仲恺的父亲也是旅美华侨，他本人就是在美国生长的。他和孙中山一样，也深知华侨的苦难，都代表当时爱国华侨的进步倾向。

(二)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首先是大力支持孙中山在海外创立的民主革命组织。

孙中山于1894年十一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的团体。首先参加兴中会的二十多人都是华侨，包括工人宋居仁、李杞、侯艾泉和资本家孙眉、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等。

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它的章程指出，“方今强邻环伺，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这段话说明了兴中会的组织是为了救国救民，这同华侨爱国的愿望完全符合，无怪它得到许多爱国华侨的同情。

兴中会最初的入会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兴中会1895年春在香港成立总部，得到了许多港澳同胞、华侨以及与华侨有联系的志士热烈支持。不久日本和越南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兴中会的机构。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三百多人，其中来历清楚的二百七十九人里面有华侨二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七十八；在这些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占百分之四十八，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与吴玉章《辛亥革命》）这些数字反映了当时几点重要的事实：一、华侨是支持兴中会的重要力量；二、华侨资产阶级倾向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很大；三、参加兴中会的华侨，就他们所属的阶层来说，那是相当广泛的。

1902年以后，孙中山把兴中会的誓词修改和补充，提出“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字表明他的民主革命纲领更加明确了。

当时美洲的洪门组织在华侨中有很大的力量，估计当地华侨百分之七、八十加入了这种团体。它发源于明末清初的秘密会党，本来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也带有互助的性质。但经过了悠久的年代，会员对本来的宗旨有的早已经不大清楚，而且分成许多派系，有的甚至一度受了保皇党的欺骗，为保皇党所利用。孙中山为了争取洪门组织为革命效力，亲自参加这种组织，于1904年为它重订章程，规定一律称为致公堂，并且把兴中会的十六字誓词当作致公堂的宗旨，鼓励致公堂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在马来亚等地，尤列等用中和堂的名义，也吸引了不少华侨参加革命活动。

1905年八月，兴中会同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所组织的光复会以及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把兴中会的十六字誓词定为宗旨。同年十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主张。孙中山在同共产党合作的时期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阐释，断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适应时代的潮流，在革命道路上不断前进的。

同盟会在南洋、欧洲、美洲等地都设有支部。它在国内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在国外华侨中却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特别在华侨最多的南洋，工作进展更为迅速。它的南洋支部，最初设在新加坡“晚晴园”，后来迁移到槟榔屿。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缅甸、越南、柬埔寨、暹罗（泰国）和菲律宾等地都有同盟会的组织。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和通讯处共一百多个。根据缅甸华侨徐赞周保存的会员证

存据，从1908年三月到1911年，缅甸加入同盟会的华侨就有二千三百四十三人。1910年同盟会在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支部，不久美国西部就组织了十五个分会。正如同盟会的著名人物冯自由所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说：“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有些华侨带着儿子一同入会，还有些华侨特地回国来发展同盟会组织。同盟会在厦门的机构就是由华侨发起的，新加坡华侨施铭和荷属东印度华侨王振邦就是厦门同盟会的主盟人。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华侨是同盟会强有力的支柱。

(三)

华侨对辛亥革命另一个巨大的贡献是英勇参加多次革命起义。

兴中会成立的第二年——189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这十六年中，孙中山直接间接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他对起义的策划，除了把会党和新军当作主要的联络对象，也把华侨当作骨干力量。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跟随他由檀香山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子等华侨。1900年十月的惠州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二次武装斗争，邓荫南、宋居仁、卢文泉等华侨也参加。

1907年日本政府答应清朝的要求，驱逐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他到河内设立革命机构，在广东、广西、云南一连发动许多次起义。这一系列起义都有不少南洋华侨参加。其中1907年五月的潮州黄冈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同年六月新加坡华侨邓子瑜指挥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两次起义都以华侨

为主要骨干。1908年三月钦廉上思起义的主要力量，是以华侨为主力的短枪队二百多人。在1907年十二月的广西镇南关（现友谊关）起义和1908年四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中，越南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和运输军火粮食，很多还参加起义队伍。

最壮烈的一次起义是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起义，也就是黄花岗之役。这是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策划的，得到华侨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志士回国参加这次起义，仅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回来的估计就不下五百人。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首，组织了敢死队回国。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华侨也有回来参加的。

这一次起义，本来计划挑选八百个革命志士组成敢死队，其中多数是南洋华侨和留学日本的学生。临时由于情况变化，彼此没有联络好，敢死队没有全部到齐，结果只有一部分在黄兴指挥下进攻总督署。他们奋勇作战，但因为众寡不敌，终于失败。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遗骸，最初被同情革命的人士收殮了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所以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陆续查明还有十四名烈士，共八十六人。其中明确是华侨的有二十九人，还有一、二个人可能也是华侨，所以有人说是三十人或三十一人，占全部烈士三分之一左右。

参加黄花岗之役的华侨烈士，有几点事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第一、在三十左右名的华侨烈士中，工人占十多名，其余有职员、教师、记者、商人、传教士等。华侨各阶层几乎都有参加这次起义的，但劳动人民毕竟是武装斗争的主力。

第二、黄花岗烈士事先都抱定牺牲的决心，有不少人还留有绝命书。例如马来亚华侨李炳辉回国时正逢他的诞辰，他写信给他的母亲，附有一首诗：“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

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可见烈士为了救国，不惜贡献他的年轻生命和牺牲家庭幸福。

第三、他们作战都奋不顾身。例如吉隆坡华侨李晚扛举起义大旗，在队伍前头勇猛冲锋，终于牺牲。新加坡华侨李文楷，在巷战中打死了很多敌人，自己身上中了几枪，血不住地流着，还奋勇杀敌，一直到战死。

第四、不幸被捕的烈士，在审讯中和临刑的时候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例如河内华侨罗联在作战的时候被捕，对探监的族弟说：“我决心舍生取义，希望弟弟们继承我的遗志。”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他，他始终不屈服，在刑场还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亡！”曾在苏门答腊火水山担任教师的罗仲霍，受伤被捕以后，在清朝官吏军警面前侃侃宣传革命，实践他的诗句：“愿将铁血造世界。”

这些烈士的事迹真是可歌可泣的。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这一次起义虽然失败，而且牺牲惨重，但是影响很大，振奋了全国人心，促使革命怒潮更加高涨。正如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所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华侨也纷纷回国参加各地起义的武装斗争，组成北伐队、炸弹队、总统宪兵队等。例如当武汉军情紧急的时候，一批归国华侨工人组成敢死队，由上海赶往武汉去参加黄兴指挥的部队。云南腾冲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起

义是由缅甸华侨张文光发动和指挥的，缅甸华侨和侨属子弟在这次起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担任重要的军政职务。

总之，在多次的起义中，许多爱国华侨和国内革命志士是一起抛头颅，洒热血的。

(四)

许多革命工作者都懂得，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革命的诞生总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宣传革命的道理。在这方面，华侨对辛亥革命也有重大的贡献。

华侨虽然早就渴望祖国富强，但是他们同过去国内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摸索救国道路的初期，只有朦胧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民主革命这条道路的。就是号称先知先觉的孙中山也不例外。他 1894 年上书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振兴实业和改革教育制度等项建议，希望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可见他当时对清朝政府还有幻想。他这次上书得不到重视，又看到清朝在甲午战争中一连打败，知道清朝腐败已经无可救药，这才深切感到非革命不可。最初华侨和国内老百姓一样，大都受着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总希望有个“好皇帝”，所以听到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很多“掩耳惊走”，认为“大逆不道”，甚至把他看作“洪水猛兽”。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更非重视宣传工作不可，而出资创办报刊来宣传革命道理的绝大部分就是华侨。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国内站不住脚，也出走到国外，在华侨中进行活动，于 1899 年在加拿大首创保皇会，主张拥戴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这就是保皇党。他们的改

良主义对当时华侨一部分上层人士很有吸引力，所以他们在世界五大洲的一百七十多个市镇设立了保皇会，向华侨募捐了不少钱。新加坡著名的豪富诗人邱菽园“散尽黄金剩鬓丝”，他的很大一部分资财就是捐给保皇党的。他们在许多地方利用华侨的捐款创办报刊，宣传保皇和反对革命。当时东京的《新民丛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纽约的《中国维新报》、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槟榔屿的《檳城新报》和仰光的《缅甸日报》等，就都是保皇党的机关报刊。

保皇党的言论成为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大障碍。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在各地华侨的赞助之下，也纷纷创办报刊，一时海外的革命报刊真象是“雨后春笋”。如东京的《民报》、檀香山的《檀香山新报》、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加拿大温哥华的《大汉日报》、新加坡的《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槟榔屿的《光华日报》、曼谷的《暹华日报》《觉民报》、仰光的《觉民日报》《全缅公报》《光华日报》《进化报》、爪哇的《泗滨日报》《前锋报》《吧城日报》、棉兰的《苏门答腊民报》等报刊，都是宣传民主革命的。

孙中山为了批驳保皇党的言论，亲自撰写《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等文，阐明中国非革命不可的道理，揭穿了梁启超“借保皇而行革命”的欺骗性，指明革命与保皇势不两立。当时同盟会许多著名的文人，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居正等，也都曾在海外革命报刊中撰写文章。后来他们受了历史洪流的淘汰，有的成为国民党的右翼分子，汪精卫甚至堕落成为汉奸，但功罪不相掩，历史事实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参加同盟会的华侨还纷纷办起“阅书报社”，如新加坡的“同德书报社”、槟榔屿的“檳城阅书报社”、马来亚霹雳的“益智书报社”、缅甸的“觉民阅书报社”、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等。仅荷属东印

度的“阅书报社”就有四十多个，缅甸也有十多个。这些“阅书报社”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真理愈辩而愈明。正确的革命理论往往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谬论争辩中更加明确和进一步发展的。民主革命派经过同保皇党在报刊上激烈交锋，终于占了压倒的优势。本来支持保皇党的人很多转而同情同盟会，连梁启超后来也“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一场理论上的激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它的主要战场虽然不在国内，而在华侨众多的海外，但对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参加革命的华侨还注意向国内同胞宣传。曾在日本参加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的青年革命家邹容，1903年写了《革命军》，这是反对清朝最激烈的一本著作。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等把这本书翻印了二万多册，改名为《图存篇》，不但向华侨散发，还寄给国内各省、府、州、县的官绅以及北京翰林院和总理衙门。婆罗洲华侨黄乃裳就曾携带《革命军》五千册回国散发。美洲《中西日报》也印发《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冯自由在日本也筹款合印《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共十万册，分寄国内外。新加坡华侨黄世仲为了鼓吹革命，写了一部《洪秀全演义》在国内外发行，有人还把它编成戏剧。

1911年八月五日清朝最大的军舰“海圻”号访问古巴，古巴三民阅书报社等侨团为了向舰上官兵宣传，特地印刷题为《海圻军人听者》的传单，利用华侨到舰上参观和舰上官兵上岸看戏的机会向他们散发，还向他们演讲，鼓动他们参加革命，感动了不少人。“海圻”号返航抵达上海，舰上官兵响应武昌起义，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来。

华侨这些宣传工作有的是当时的国内同胞比较难于做到的。

(五)

华侨在经济上支持祖国革命的功绩更加突出。历次起义的枪枝、弹药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平时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等宣传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旅费和生活费，等等，绝大部分是华侨供应的。孙中山回忆他领导起义的历史也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的时候，在经济上就是完全靠华侨支持的。当时在檀香山，孙眉自愿捐出一部分财产充当革命的活动费。后来为了筹集起义的军费，孙眉还不惜把他的畜牧场的牛降价出售，每头仅卖六、七元。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的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军费。

孙中山从1895年起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的一系列起义，每次军费也都得到华侨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至1908两年的几次起义就共得到华侨捐助约二十万元。西贡华侨李卓锋对防城、河口、镇南关等处的起义，一个人就捐了军费几万元。黄花岗之役的军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十三万元，结果筹得港币十八万七千多元，其中美洲华侨捐了七万七千元，南洋华侨捐了八万余元。

武昌起义一开始，华侨为革命捐款更加踊跃。广东、福建、云南、上海等地在光复中都得到华侨捐款支援。据当时广东省财政司收支总册报告，从1911年十一月九日到1912年五月底这半年中，华侨支持广东光复和革命政权的捐款和借款就共达一百七十五万八千多元。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财政非常困难，也得到华侨捐款援助。华侨庆贺他就职的电文，很多附笔提到捐